

14



'92
2

第46卷

江西文史资料

●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

2057/07

江西文史资料

•46•

峥嵘岁月

难忘方、邵风采

——方志敏、邵式平、缪敏与我的几次战斗生活

.....祝金南 (1)

大余兵暴纪实陈正湘 (10)

光荣使命

——我为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抗日作交

通联络工作.....余应先 (20)

北伐军击溃“劲旅”杨镇东

.....林志明 (27)

赣籍将领

赣军名将赖世璜.....周红兵 (30)

乡企史

逆境中奋起

——记深受人们拥戴的农民企业家钱树标

.....广决、宪洪、润生 (37)

女代表的脚步聂志刚 (44)

联营使我厂插上了“金翅膀”

.....熊爱民 (48)

千年秘方春常在，固子补酒显神效

——创办江西吉安固子酒厂纪实连晓 (58)

十四把篾刀办起砂轮厂

.....徐志农 干平如 (64)

李渡烟花怒放在异国他乡梅轶 (71)

永丰城郊的“顺外”式村聂益先 (74)

绿色企业之歌陈美德 (82)

主编 聂国柱 副主编 曾粮 责任编辑 雷心刚

料 到市场风浪中搏击
——乐安县江边机械厂开发新产品的历程
.....陈阔生 (86)

人物春秋 赖汝雄将军二、三事...宋雁如 (90)

文化篇章 八十年来江西高校图书馆事业
.....彭友德 (96)

经济史苑 我家经营杨福生瓷厂始末
.....杨石成 (107)

政
坛
忆
旧 树倒猢猻散
——于都解放前夕的一场闹剧高 岚 (115)
刘昆良之死沈棣初 (117)

剿匪实录 井冈山剿匪纪实汪明敏 (119)

本辑编务 涂苏中 易芳霖 胡群红 黄 茜

编者：江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电话783861）

承印：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

印数：1—4000册

刊号：赣刊字第01—148号 每册：2.20元

· 峥嵘岁月 ·

难忘方、邵风采

一方志敏、邵式平、缪敏与我的几次战斗生活

祝金南 口述 吴威亚 整理



· 方志敏像 ·

- | | |
|---------|-------|
| 一、俘虏敌县长 | 成立运输队 |
| 二、突出邓埠 | 险遭不测 |
| 三、打破封锁 | 采购食盐 |
| 四、遇险沉着 | 从容对敌 |
| 五、火烧碉楼 | 过河脱险 |
| 六、藏身水仓 | 遇巧过河 |

1929年9月，画桥鸿鹤嘴村组成了中共余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以后，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方志敏、邵式平、缪敏同志都经常前来余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当时，我的姑父童开宝（1988年3月1日去世）是红十军的一名营长并兼办军需，他见我倾向革命，便介绍



· 邵式平像 ·

我和族叔祝怀恩、祝带金、祝天富（后来均为革命献身）、祝瑶心等，秘密前往弋阳县漆工镇青年骨干训练班参加学习。方志敏、邵式平逐日亲临班部讲课，此后我们便熟悉了。结业后我回到余江，以打渔为公开职业，秘密参加了革命工作，姑父童开宝家也成了余江青年骨干分子的秘密联络点。下面是我和方志敏、邵式平、缪敏同志在一起共同经历的几次战斗生活。

俘虏敌县长 成立运输队

1931年农历六月初六日，烈日当空，暑气蒸腾。这天，我歇过昼后便独自荡着渔船在信江河撒网捕鱼，只见沿江岸五个纤夫埋头拉着一艘贵溪“刁子”大木船逆水而上。突然，船篷里钻出两个外县口音的大汉，高声喊叫买鱼，我高兴地把小船划近“刁子”外弦，希望发个利市。只见船后舱坐着一个官气十足的中年男子，身旁还有两个妇女，一个是半老徐娘，另一个却风姿绰绰，年纪很轻，看打扮察神态，她们一定是官儿模样的妻妾。转眼再瞅中舱，有一个师爷身份的人在倚舷看书，两个护兵各自抱着一挺花机关枪在打瞌睡，前舱和桅舱挤着五六个肩挂短枪的武夫，横三竖四在吸烟闲聊。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出公差的官船，带有“情报性”，便主动让价，使买卖成交了。之后我从容靠岸，拴好船绳，手提鱼篓，像别寻顾主，翻过高河堤，撒脚向美塘村姑父家奔去。到达后，却见方志敏同志和我姑父对面而坐，正细声交谈。我急切地把刚才所见所闻，简要说了一遍。方志敏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后，微露笑容，对童开宝说道：“正好，大部队来到就有武器送上门来……”，接着小声和我姑父耳语一阵，又转脸对我说：“小祝，你替我送封信给那官船上的当官模样的人，可有此胆量？”我立即立正，说了声“敢！”方志敏同志满意地笑了。他拔出水笔飞快写好了一封不过百把字的信，同时解下自己腰中佩带的手枪，连信一同交付给我，低声叮嘱我不要紧张，他们不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只接过信没有拿枪，羞答答

地说：“我不会用手枪。”方志敏同志当场把推弹上膛、扣火射击的简单动作传授给我，临别还说，带着手枪还不是壮壮赤卫队员的威风，保险一时还用不着这手枪发言。他的话使我这个19岁初次参加战斗的生手，胆子大了许多，增强了信心。我把手枪插在背后腰带上，转身便去赶那官船，在高堤上跑着，看那官船蜗牛似地被纤夫拉走了约两华里左右。快近“刁子”时，我发现高堤背面散开蹲着一百多红军战士。姑父紧走几步朝我迎来，叫我不要看堤背，并说非到万不得已不可主动开枪，不要惊动了沿河碉楼里的自卫队。我满有把握地走下河堤，叫住行船，声称有紧急公文投递。边说边淌水近船，赶忙送上信件。几乎与此同时，预伏堤背的战士，端着步枪，虎跃般整齐站在堤面，两挺轻机枪也对准了官船，齐声断喝：“缴枪不杀！”我见那官儿面如死灰，两个婆娘吓得大哭，众护兵也缩作一团。这时我拔出手枪，指着那官儿命令他老实上岸，带枪的放下武器，高举双臂，分成纵队紧跟其后。童开宝带了一个班上船搜查，方志敏同志站在不显眼处注意观察。少时搜出长短枪10余支，包括那两挺能连放50发子弹的花机关（后来知道这种枪叫手提式巴尔克满）。那个师爷模样的斯文汉原来是个医生，带有满满一大箱西药，那更是当年革命根据地视为珍品的紧缺物资。事后得知那当官的是由南昌去贵溪上任的新县长姓张，带了妻妾亲兵去接印到职，却做了红军的俘虏。通过这次斗争，方志敏同志认为我警惕性高，比较机智，也有胆识。

这以后不久，由于斗争需要，特委决定秘密成立水上运输队，以公开的职业掩护秘密运输。方志敏同志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金南，革命需要有个水上运输队，已研究决定由你去担任运输队长，立即组织船队，负责水上运输，随时准备接受任务！”我腼腆地说：“我是个睁眼瞎，当队员可以，队长我干不了！”只见方志敏同志脸色一沉，严肃地对我说：“金南，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是卖鱼可以讨价还价！”我意识到自己错了，马

上立正报告：“服从组织决定，接受任务。”从这时起，我便担任了水上运输队的队长，主要负责运输物资，保障苏区供给。

突击邓埠 险遭不测

信江生擒国民党县长，虽然马到成功，但不是主力部队来此的主要任务。赣东北特委的决策是：计划在当天，即农历六月初六日深夜，突袭余江县锦南重镇——邓埠镇。姑父童开宝紧急通知我立即组织数十只大渔船，待命贵溪县塔桥地段河边，运送红军渡过信江。我顾不上吃晚饭，便邀祝带金和祝天富（不久他两位被任命为运输队第一和第二副队长）进行紧急动员，同时又叫胞弟祝金东、祝金西协同工作，很快便集中了30多条可供湖面作业的大渔船，驶赴指定地点，到达目的地后看到童村也有十多只渔船傍岸停泊在那里。三更前后，全军顺利横渡信江进入余江县境。姑父童开宝率领的前锋部队已先由童村渔船送上对岸。这次渡江除了方志敏同志外，邵式平、缪敏两同志也参加了。三位主要领导都乘我的渔船最后督阵殿后，我又一次受到了他们的表扬。

不料第二天10时左右，国民党区自卫队长阎向发（土改中被镇压）领着10多个武装自卫队员，在祝、童两村捉人，一时20多个渔民被捕，统统关押在区公所里，酷刑追问谁领头封船助“匪”过河，大家都说：“身不由己”，却始终不肯说出动员集船的主持人。自上午到下午4时，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我和童村的渔民被五花大绑，押赴野外执行枪决。那位童姓渔民一枪毙命，刽子手又把枪口顶住我的后脑勺，一扣板机却是瞎火，弹塞枪筒，不能出膛。原来当年自卫队的武器，多是伪造“单打一”的老毛瑟，这种枪的子弹粒大个儿粗，弹头是铅铸的，一击之后，枪管高温，再发时铅弹头软化，即或射出枪口，数步之远弹头即下坠落地，杀伤力很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地下党员发动各村民众，各人手拿农具，鼓噪而来，并大声说道：

“渔民不出船他们（指红军）不依，出了船你阎队长要杀人头，老百姓哪有生路？”阎向发见人如潮涌，四方奔来，不由胆颤心惊，马上仓惶夺路而去，我才死里逃生。

后来，方志敏同志考虑到我已引起区公所的注意，密令童开宝通知我们暂时离开本地，去执行一项没有枪声但又是十分艰巨的战斗任务！

打破封锁 采购食盐

1930年8月14日红军撤出余江后，反动县长毛侃逃命回来，慑于红军的声威，惊魂稍定，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城防，同时加紧封锁苏区，妄图逼走红军。他首先把城墙加高3尺，并强征民工大挖护城壕沟。12月又在黄土岭及东门外蔡家山先后修建三层碉堡楼各一座，接着电请应援的国民党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一个团驻进了城内的天主堂。上述各项安排就绪后，他的反动气焰更是有增无减，竟强令上万民工在新洞门外修筑临时飞机场。老百姓被坑害得叫苦连天，激起全县民众联合向南京、南昌呼吁，控告毛侃的“苛政猛于虎”，并得到各地余江同乡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他遍设关卡，严禁食盐、布匹、药品、电筒、土硝等重要物资进入苏区，卖力地进行经济封锁，给苏区人民的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我赣东北特委对这一严重情况，命令由我带同祝带金、祝天富化装成商人，掩护缪敏同志远航白区各县镇，采购食盐等紧缺物资，以解苏区军民吃用的燃眉之急。

缪敏同志虽然只比我大三岁，但是她足智多谋，遇事安排非常周密，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穆桂英，她身材矮矮墩墩，举止大方，谈话机敏，活像一个久经商场的女老板。她的芳名时而叫祝细姪，时而又是李祥贞，还有一个宋大妹的化名。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她和我们三人以姐弟相称，由于她料事如神，指挥若定，所以我们走南闯北，去过南丰、九江、武宁等县“经商”，从来没有露出破绽。

1931年初冬，我们首次远航星子。这里远离苏区，哨卡检查较宽。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买盐运回苏区，以应急需。缪敏同志购了一批浙江细沙白盐和粗沙白糖，杂装在舱里“鱼目混珠”。她知道国民党税卡人员个个见钱眼开，只要舍得递红包，就能收到“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的神效。尽管当年反动派封锁森严，然而苏区红军仍然保证了必要的食盐供应，缪敏同志的辛勤工作和机智对敌对此是有卓越贡献的。水上红色运输线在她的领导下惨淡经营了近两年，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斗争经验。那个凶恶残暴的阎向发看到我们三个衣着整齐（公费缝制的工作服），经常走水“做买卖”，认为我们已“改邪归正”。说穿了，他也抽了我们不少当年还很难得的“哈德门”香烟哩！

遇险沉着 从容对敌

1932年4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塔前一带河面捕鱼。远远看见一位身材修长，头戴草帽，身穿长衫，好像绅士模样的人，从堤坡草地向河岸荒沙洲慢步踱来。我定睛一看竟是方志敏同志，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赶忙拢船就岸，请他快快上船，并给了他一套白短褂裤，让他换过衣装。我问他有何紧急情况，值得单独行动。他简单说了个大概。原来他是来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了解肃反结尾工作情况的，因苏区吃盐普遍欠缺，顺便找童开宝尽快发动各水、陆购盐小组，设法购盐。碰巧他不在家，知道我常在这段水面作业，所以疏散卫士，只身来河边找我。他郑重命令我要把这个任务转告姑父童开宝立即执行。我们只顾说话，不料从贵溪界铺方向有6个武装靖卫团丁急步向小船走来，我的头皮顿时发麻，手足失措。方志敏却神色自若，把两支驳壳枪都顶上了火，倒插在背后腰上，操起一柄短桨，索性坐在船头慢慢轻荡，全神贯注看水中的鱼群。我暗暗佩服这位革命者临危不惊的胆识，也非常赞叹他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他的动作活像一个水上渔家里手。不一会来人已走到河边，我被方志敏同

志沉着的气度所感染，也装着一心看鱼，摆着捉网将撒的架势。突然一个小头目大声发问：“你们两个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路过河岸没有？”我说：“老总，我们一心打鱼，没有留神岸上。”说着我有意把船划横，让来人一眼把小船望个对穿，篷篷里空荡荡无物，只有我和化了装的方志敏同志，一前一后坐在船头船尾。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只得折回原路，逆水追踪而去。这时我不禁呼出一口长气，叫了一声“好险！”方志敏同志笑笑向我点头，夸我刚才配合得很好。他说：“一个革命者随时都可能遇险，就是沉着二字能够转危为安。我估计贵溪县靖卫团丁不会知道你的底细，所以大胆冒险。万一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行藏，我这两双枪一举，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们都休想活命，但是这样干对你我就十分不利了。”说着他把两支快慢机退出了顶火子弹，我也把船划向余江境内，他临到上岸还嘱咐我赶快找到姑父童开宝，传达党的指示。他登岸后钻进一片浓密的芦苇之中，恰如鱼入大海，任意西东了！

火烧碉楼 过河脱险

我和邵式平同志接近的次数最多。别看他对敌人憎恨，被人称作“邵阎王”，而在同志们心目中他却像一位慈祥的大哥。有一回他在船上笑着问我：“小鬼，听说你的水上本领不错，今天露一手给我看看怎样？”我二话没说，“冬”的一声，一个猛子扎进水中，侧着身子左右摇晃，胸部露在水面上，踩水横渡了信江一个来回。事毕，我不由得高兴地夸口说：“莫说小小信江，就是赣江鄱湖我照样能顶风踏浪如履平地。”他将信将疑，并告诫我不要骄傲，要下苦功锻炼，红色水上运输线的队长，没有过硬的凫水本领是不行的！

哪知他说这话不久，现实便给了我一场严峻的考验。1932年7月，我刚和缪敏同志运盐回来，在家少憩。闲着没事，便荡舟在白塔河中捕鱼，不一会遥见离中童约3华里的杨村河升起滚滚

浓烟，正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忽见邵式平同志手握短枪向河岸急步走来，这时把船划过去已是来不及了，我马上跳到河中迎上前去，要他脱下长裤，缠在头顶，布鞋捏在手中，我背起他就往河心奔跑。他说：“我150多斤你驮得了过河？”我答道：“水里驮两个150斤何妨？你只要沉住气，不要乱动就行。”哪知他不识水性，除了把手枪皮带套在我颈脖子上外，两手连鞋死死勒住我的喉管，无法喘气。我只好直说：“老邵啊，两手攀紧我的双肩就行，等会到河中央你还要提起小褂，我踩水送你过河。这样勒住我的喉管，比潜水闭气还要难受。”他噗哧一笑，依了我的意见。7月河水干枯，我们很快过了河进入贵溪地界，他穿上长裤按起鞋，甩开大步向村庄走去。

邵式平同志这次手握短枪来到河边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天上午，他得知杨村和徐村间的碉楼上只有保长徐多仵和保队副徐老仵两人守望，他认为机不可失，当即带了连长熊森茂和20多名游击队员，肩荷农具分向目的地集合，乔装上坡劳动。碉楼顶层的两徐见情况有些不对，将步枪机栓掰得咯咯作响，喝令不准走近楼前。这时电话线早被剪断，他二人更加慌了手脚，惊吓中竟把枪栓拉下落在楼外墙根。邵式平同志高喊投降不杀。可是两徐认为碉楼牢固有恃无恐，拾起楼顶早已准备的鹅卵石，向下轮番投掷，砸伤了我两个队员。连长熊森茂领着几个队员奔进村庄，借来两张方桌和数捆稻草，3个队员头顶方桌，撬破了大门，立即点燃稻草。时在三伏季约，火仗风势，风助火威，顿时火已封死梯路，吓得两徐大叫“饶命”，只得从碉楼墙外攀绳下来做了俘虏。大家一齐动手挖墙基，摧毁了这座碉楼。由于工具落后，此役进行约1小时，这样便引发了一场风险。

这时8里路外的双凤街，见远处浓烟不熄，电话又不能接通，情知有异。于是80多人枪的区自卫队倾巢出动，小跑奔来。秋天地燥，邵式平同志见远处尘土扬起，知道有支援人马赶到，便下令化整为零，四向隐蔽。他却向河边走来，想找船渡河，不

想凑巧碰到了我，只是稍受一场虚惊而已。

藏身水仓 遇巧过河

1932年农历八月中秋刚过，我把渔舟驶向余江与贵溪交界处的曾头（同音）刘村附近江面捕鱼，下午4时左右，缪敏同志从云塘余家村方向顺着一条凹沟缓步走来。我摇船近岸，请她上船歇息。她通知我说，明天出鄱湖去执行买盐任务，要我作好准备。因我们正商谈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放松了瞭望。突然云塘余家碉堡的10多个反动自卫队员朝江面奔来，情况万分紧急。为了缪敏同志的安全，我只好打开船尾水仓甲板，请她在水仓中暂避一时。她个子不高，却很壮实，小小水仓竟容纳她不下，再卷曲还有一条缝的白布褂露在外边，十分起眼。我慌忙将自己的一件灰色小褂放在她的背部遮掩一下，当时算是最好的掩护措施了。这时，岸上的自卫队员也到达河边，他们高声问我：“刚才下沟穿白褂的妇女哪里去了？”我急得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见什么穿白褂的妇女，从来也不曾和妇女说过话。”这话一出口，却恼怒了其中一兵，他高声喝道：“拢船近岸让我们搜！”我被吓得心惊胆颤，暗想这回弄不好后果真不堪设想。正行动迟疑间，我见那带队头头是广东老兵油子滕冲，早年瑶池祝村和贵溪罗村械斗时，他曾在我村当过“保镖枪手”，因此我俩过去很熟。这真是意外巧遇。就在这紧急关头，他呵了一声说：“原来是金南小老弟呵！”说着又面向众队丁介绍道：“他是瑶池祝家横标的崽，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实娃伢。”接着又问我：“你看见一个穿一身白褂的矮胖女人从这里过河吗？”这时我的胆子壮了许多，便一口咬定说：“我不曾见什么妇女，更不敢正面看妇女，也许太阳快落山，照得水面发白吧！”滕冲问问不出什么名堂，把嘴向前一呶，暗示队丁继续往下追寻。等他们走远，我喊出缪大姐，只见她被憋得满脸大汗。我提醒她说：“下次你要特别小

（下转第19页）

大余兵暴纪实

陈
正
湘

“啪”清脆的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大余县新城镇。1930年仲秋的一个深夜，驻赣南之国民党滇军军阀朱培德的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八连（后有七连）部分士兵宣告起义了。

我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倒戈当红军，是起义士兵的共同心愿，是我们经过一年多观察、思索所做出的正确抉择。

这一正确抉择不仅使自己找到了光明的前途而且在革

命事业上也算是贡献了一点微薄力量。所以，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了，但在今天仍值得回忆。

一

为了把起义事件讲清楚，须得先谈几句促使这一行动的背景。

1928年12月中旬，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井冈山，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丈，急令江西、湖南两省军阀，集中重兵，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 行“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开辟新的根据地，次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

那时，我正在三十四旅六十八团八连当兵，旅长马昆，团长杨映智，部队驻防吉安永阳镇。一天，马昆命令我们团立即出发，与赣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和七师二十一旅李文彬两个团一起，共同“追剿”南下之红四军主力，所有“追剿”部队统归李文彬指挥。

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以南

地区出发，占遂川、过崇义，很快进占大余县城。不久，李文彬部向大余进犯，双方展开激战。为了预防红军向“三南”（龙南、定南、全南）突进，李文彬令我们团插到大余东南二十余里的地方，控制山地隘口，以截击红军。

我们控制的隘口，是红军突破赣粤边境，向“三南”进军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苦战一天的红军通过这里时，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不能不说是李文彬的如意算盘。

但滑头的杨映智与李文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心里另有一本“小九九”：保存实力，不与红军交锋。当红军从大余南渡经过隘口时，杨故意让开通路，待红军通过后才开火。我们在山头上胡乱打了一阵机枪，盲目地打了几发迫击炮炮弹。这实际上是打给李文彬听的。

在一个多月的所谓“追剿”中，我们团总是在刘旅后面跟进，距红军十几公里，一直未同红军交过火。而红军在

进军途中并不恶战，偶遇追堵之敌，或者攻其一“点”，打了就走，或者金蝉脱壳，使其不知去向。2月10日（旧历春节），红军在瑞金以北二十余公里处大柏地一带，利用有利地形，杀了个回马枪，重创尾随其后的刘士毅两个团，俘八百多人，缴枪支弹药不计其数。

东固地区，是红军二、四团于1928年夏初开创的游击根据地，红四军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我团在李文彬的催促下“追”到此地，红军去向不明，天又变了脸，于是山上山下烟雨茫茫。正当我们被红军拖得人疲马乏、狼狈不堪之际，电报传来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我团即按指令撤到吉安休整待命。这次“追剿”活动便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了。

后来，我们又奉命对赣南、闽西进行过几次“清剿”和“进剿”，每次都徒劳往返，以失败告终。

但是，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却使我们逐渐加深了对

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进剿”途中，我们看到了《红军第四军党部布告》提出的“民权革命”的三大任务（即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予农民；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同时，还看到了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签发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此布告明确宣布：“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发给田地，士兵有份”、“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我们耳闻目睹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苏维埃政权及赤卫队（暴动队）、儿童团、农协、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广大劳苦大众扬眉

吐气，拍手称快。共产党和红军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宗旨和主张。

红军为人民，人民爱红军，红军与老百姓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一次，我们从赣州出发到于都以北“清剿”，看到沿河两岸及山上到处红旗招展，不时听到土枪、土炮和机枪（实为燃放于铁桶里的鞭炮）声，我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不敢贸然前进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苏区群众为掩护红军而虚张声势，这与国民党部队欺压百姓、百姓憎恨国民党部队（被群众称为“白匪”）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次次见闻和经历，对囿于国民党部队的士兵们来说，无疑是一堂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渐渐地，我明白了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和外国侵略者之所以对共产党和红军恨之入骨，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红军专跟他们做对，而一心一意为贫苦大众谋利益。事实擦亮了 my 眼睛，使我这个为了活命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做杂工的穷苦人，心里燃亮了一盏

灯。脱离军阀部队，参加工农红军去！

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使我逐渐了解共产党和红军，并萌生参加红军的念头，与下述因素不无关系。

潜伏在六十八团的司令部中尉书记官张扬、一连中尉排长王透、二连上士文书彭加伦（党支部书记）等，常常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如利用整训或星期日，到我连连部以学唱京戏和学拉二胡为由，向士兵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革命道理，介绍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因为当时他们的身份是不公开的，所以别人不知道他们就是共产党员。

1930年1月，六十八团奉命“进剿”于都桥头，第二营遭红军迅猛反击，被迫溃退上堡。三营九连中尉排长杨绍如（中共地下党员）以掩护二营撤退为由，把这个连拉了出来，途中起义投奔了红军。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大概由于不便潜伏下去了，或是其它什

么原因，张扬、王透、彭加伦等人也脱离六十八团，到了苏区，真正清楚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团有少数连、排长过去曾在朱德任团长的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里受过训练，有的亲耳聆听过朱德的教诲，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很少听到他们讲共产党和红军的坏话。八连连长杨济民大概也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对下边的事情（如听到什么议论等）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我连的“老兵油子”杨志华，以前当过少、中尉排长、后几次被降职，当了中士排长。他是队伍离开云南前早就参加滇军的，对朱培德第三军的内幕比较了解。他常骂朱培德、马昆等人是军阀、恶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嗤之以鼻。一次，团里一个所谓“政治特派员”利用“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平时每周集合全团训话）的机会，重弹反共滥调，并恶毒丑化朱德、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杨志华便对我们讲：“别听他那一套，说人

家共产党、红军怎样怎样坏，纯粹是胡说八道。”还说：“我见过朱德，听过朱德演讲，他熟悉国情、民情，关心士兵生活，讲的道理我们口服心服；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有空就同下面的人‘摆龙门阵’（聊天），大伙都尊敬他，根本不像他们（指特派员等）说的那样。”杨志华这样的人，对共产党和红军来说，起了义务宣传员的作用。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战争爆发了，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6至8月间，红一军团向闽西、赣南进军，尔后挥师北上，占领了南昌至九江一线的许多县城和车站，继而向西发展，横扫靖安、奉新、高安、宜丰、上高、铜鼓、万载等地。接着，西进湖南，在浏阳会合三军团，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此之前，红四军几次回赣南征战，攻克南丰、会昌等九县，推动了赣南各地工农群众的起义，特别是罗炳辉领导的吉安、吉水等

八县保安队起义，使赣南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

此时，江西境内除南昌、吉安、赣州、南康、大余等有限的几座中、小城镇和小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城镇和乡村已被红军控制，国民党反动派惊呼：江西被共产党“赤化”了！

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激励了我参加红军的愿望。

三

脱离军阀武装，参加工农红军，我是暗下决心了，但我不愿自己一走了之，我打算联络一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行动。那时，我们八连士兵已有了自己的组织——士兵互济会，我决定以互济会作掩护，首先在互济会里寻觅知音。

互济会的负责人是四班副蒋安之（湖南石门人，原在二十军）和五班长靳某某（皖北人，原在何健的三十五军，名字忘记了），连里大约有一半人参加了这个组织。互济会的